

民国北京城：

历史与怀旧

Republican Beijing

History and Nostalgia

董 玥著



SDX & HARVARD-YENCHING
ACADEMIC LIBRARY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SDX
&
H-Y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民國北京城：

風俗與生活

Republilian Beijing

Customs and Lifestyle

◎ 游 燕



游燕

游燕

游燕

游燕



SDX & HARVARD-YENCHING
ACADEMIC LIBRARY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董 玥著

民国北京城：

历史与怀旧

Republican Beijing
History and Nostalgia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This Academic Book
is subsidized by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nd we hereby express
our special thanks.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 / 董玥著. — 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0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ISBN 978-7-108-05091-5

I. ①民… II. ①董… III. ①北京市—地方史—民国
IV. ①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7682 号

责任编辑 曾 诚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制 作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875

字 数 307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46.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本丛书系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丛书，
面向海内外学界，
专诚征集中国中青年学人的
优秀学术专著（含海外留学生）。

·

本丛书意在推动中华人文科学与
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
奖掖新进人材，鼓励刻苦治学，
倡导基础扎实而又适合国情的
学术创新精神，
以弘扬光大我民族知识传统，
迎接中华文明新的腾飞。

·

本丛书由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共同负担出版资金，
保障作者版权权益。

·

本丛书邀请国内资深教授和研究员
在北京组成丛书学术委员会，
并依照严格的专业标准
按年度评审遴选，
决出每辑书目，保证学术品质，
力求建立有益的学术规范与评奖制度。

序

Thomas Bender

(纽约大学教授)

现代城市并不仅仅是一个充满社会差异的场所，同时，它也打上了“时间性的复杂重叠”（complex overlap of temporalities）的印记。多年以前，费尔南·布罗代尔坚持“社会时间的复数性”的重要性，他提到了“人类生活中多重的和互相矛盾的时间观念，不仅形成了过去的实质，同时也构成了当前社会生活的纹理”。也许是因为他曾在他的巨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949；英文版，1972）中给出了一个有关历史“长时段”（la longue durée）概念的重要性的有力例证，历史学家们非常关注他的历史中的时间观念这一层面。但是，对于布罗代尔来说，社会世界是由许多时间性（temporalities）和许多历史性构成的，而城市的社会生活恰好证明了他的观点，因为他的这一观点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关于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关系的一种陈述。

董玥的《民国北京城》揭示出，城市就是这样一个体验多元的时间性，并将它们联系起来的场所。城市为探寻时间性的文化史提供了一个场所，一间实验室，因为时间性的文化史正是从城市的日常生活和艺术再现中得到表达的。董玥详细阐述了“过去”在“现在”中所占的位置；她的重要论题是在这座正在经历着现代化而且是有着自觉意识的现代化城市中，过去、历史、记忆甚或“怀旧”所占有的核心地位。这对于现代性的研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对于传统、历史及现代城市中“遗产”（用旅游部门的话说）的研究也很重要。

董玥的北京研究的时间框架是1911—1937年，这一阶段属于中华民国的核心时期。而这个帝国主义的高峰期不仅仅对于中国历史和北京史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同时也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城市变迁的历史时段。在“一战”前的数十年间，城市之间被贸易和投资（按比例计算，其数量超过了20世纪末）、人口流动、观念和城市化技术的传播相互联结起来。现代化过程和现代规划在每个大陆上、在宗主国和殖民地国家都在发生，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和拉美国家这样的半殖民地。

虽然董玥的研究集中在北京，但是我们需要讨论这一更大的背景，因为这个背景能够强化她的论点，并开启她与其他城市的历史学家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一部分指向对那一历史时期城市史的比较研究，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指向发生于城市间的，关于对城市的期望、城市理念与规划实践的流动关系的更深入研究。董玥力图打破那种由西方到东方的单向发展的现代性的简单东/西二元对立。对于城市现代性的表征（symbols）之全球流动的历史探寻，能够增强她这一更加具有复杂性的历史叙述，同时揭示出它的更广泛的相关性。

我们今天常常谈论现代性不属于某一个国家——不论是美国、某些国家的集合，或是整个西方——的可能性。即便是谈到上个世纪的发展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以某种形式存在的这样的可能性。我们可以想象存在着这样一种环绕全世界运转的“国际市集”，其中充斥着各种代表城市现代性的标志符号与实践。当然，在这个市集里，某些国家与文化相较于其他国家确实贡献了更多的物品，其中有的国家甚至拥有强加于人的力量。然而，没有一个国家是单纯的

贡献者（或支配者），也没有一个国家是纯粹的借用者。游览这个市集的既有殖民宗主国，也有边缘国家。殖民宗主国的大都会之间互相学习和借用，边缘国家的城市也是如此。而还有一些殖民地宗主国甚至先在它们的殖民地开展某些现代城市实践，然后再将它们带回“老家”。

要探究一个世纪前的这样一种城市历史以及现代城市文化的全球发展，我们需要将大都会作为一个单独的类型来看待；不是把它从其他历史中分割开来，包括民族国家的历史，而是把它看作这样一种历史：它认为现代大都会的发展是全球范围性的历史过程。尽管本书的对话对象是新近发展起来的中国城市史的研究，但是它对其他国家的大城市的类似研究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包括卡尔·休斯克（Carl Schorske）关于维也纳的研究，杰弗里·内德尔（Jeffrey Needel）关于里约热内卢的研究，以及有关巴黎的大量研究。而反过来，今后这些城市——以及其他城市——的研究者则必须关注董玥的这本著作以及最近出版的其他有关北京和上海的研究专著。

像米歇尔·德塞·杜（Michel de Certeau）一样，董玥研究了城市日常生活与历史感和现代化的城市规划中一些问题之间的关系。然而董玥的研究超越了大部分人对日常生活的记叙，因为她懂得，对日常生活的理解不能离开对国家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以及历史在现代城市中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

很多从“日常生活”角度展开研究的学者们过度赞美“平凡与琐碎”。与这些日常生活的赞美者一样，董玥也怀着极大的同情考察了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长期以来无甚变化。但是通过聚焦日常生活与国家力量之间的精确关系，至少是在城市公共空间这个问题上，她的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一个很小但非常吸

引人的例子就是城市规划者对胡同所做的改造。胡同是北京以及其他一些中国城市在历史的积淀中形成的典型居民区。在规划者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有一个看似很小但对于当权者却很麻烦的问题就是胡同的命名。从前的胡同通常是以某一个地标、一个市场、一口井或者一条河流之类的东西来命名区分的。这样的命名方式导致了很多人胡同的重名。重名破坏了现代规划中的理性原则，而规划者们希望将城市变得井井有条，因而他们给那些重名的胡同全部重新命名。当地居民对此既不是简单的默许也不是抵制，他们用两种方式来应付这件事情：口头上仍然继续使用以前的老名字，而允许当权者在路标以及相关文件上使用新名字。

董玥讲述的这个小故事使我想起了自己在纽约的生活经历。我住在美洲大道（Avenue of the Americas）旁边的一个街区，这个名字被用在这条南北方向的主干大道上是为了强调拉丁美洲和美国的团结。这个名字有着很大的含义，地图和路标上也通用这个名字。但当地人仍习惯叫它第六大道，我也习惯于这样称呼。这是为什么？这代表着一种反抗吗？其实不尽然；这不过是实用主义而已：人们从经验出发自然而然地将位于第五大道和第七大道之间的那条路称为第六大道。如果规划者和政客们为了他们的目的称这条道路为美洲大道，我也可以接受；而我在口语中使用当地的习惯用法，对他们来说也不成问题。

这些小例子将我们引向由拉丁美洲作家和评论家 Angel Rama 所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理论。在他去世后出版的《“文字”的城市》一书中，他描述了这些“掌控文字”的精英的强权，是如何定义拉美城市的文化与内涵的。他同样还描述了有教养的人的城市、用地图的人的城市，以及权力垄断者的城市。他们的城市同样是规划者的城市。在他看来，这个“文字的城市”由它自己的资助

阶层来统治，主导着城市生活。但是董玥展示了对这个“文字的城市”的硬抵抗和软抵触。她揭示了城市规划者和社会科学家眼中的文字的城市与经验的城市之间的一系列回合。董玥关于上述互动及平民语言和历史的实践合法性的观点同 Rama 相似，但是她的分析要丰富得多。

她对日常生活实践和过去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探索对我们理解现代性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以北京的一个独特市场——天桥为例，董玥发展了她自己一套对于那里独特的物质交换及其文化内涵的观点。这个公共空间的日常交换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更为广阔的阶级和时间关系。基于对这个旧货市场的观察，她发展出了“传统的回收”（recycling）这个概念。这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展示了现代城市现实与历史之间的动态关系。在天桥这个地方，过去以旧的物品的回收与再流通的方式得以在现在存续下去。这些物品，特别是衣物和装饰品，携带着各自不同的设计和材质，带着不同时代的烙印，在新的时期、新的主人手中产生了新的意义。

天桥展现的是回收与再循环中的秩序与效率。虽然构成天桥的物质材质与北京的其他部分是一样的，但是它在流通链上却占有一个很特殊的位置。这里的贸易既不同于老式的供应皇族朝廷和官员的店铺，也不同于服务城市新兴阶级的新型商店；这里的娱乐拒绝被大规模生产……天桥的活力来自于它作为整个北京回收和再流通的中心的地位。回收不仅仅是简单地把旧的带回现在；它涉及通过劳动力的付出让旧时的碎片重获生命，并在它们身上创造出新的价值。

记忆与传统（以及过往的实体残留）也是同样。董玥揭示了一个过程，它解释了为什么在现代性中，“过去”的存在不仅仅是一

种存续 (persistence)。历史与现代性总是相互建构的。就像她质疑东西二元对立一样，她同样质疑将过去和现在的二元对立。相反，她所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互动的或循环的模式，是对过去的回收与再循环。

人们通常会期待首都代表一个国家。有时候，一个国家的中心城市并不是其首都，比如悉尼、里约热内卢、圣保罗、上海、纽约。而有些城市曾经不得不应付它们失去首都地位的困境，例如里约热内卢、纽约，以及在中华民国时期的北京。不管中心城市是否是一国的首都，它必须建立起自己与国家历史之间的联系，或者说是中国人常用的“民族精神”。北京向董玥提供了一个精彩的机会，让她能够观察所有这些可能性，包括北京从皇朝都城（也许是最典型的“文字”）如何转变为一个共和国首都，然后是前首都的过程。这些问题和阶段对全世界范围内的都市生活历史研究来说，都至关重要。

董玥的研究中许多主题汇聚在她对作家老舍的分析中。老舍以文学的形式捕捉了那种将历史情感和现代野心联系起来的“回收”，展示了二者之间的不可分割性。我们通常认为这样的作家由于对“老旧”和“平凡”有着强烈的爱好而逃避现代城市。然而，他们所展示给我们的其实是新与旧的对话。在阅读了老舍的作品以及董玥的“回收”的概念之后，我们对比比如说欧斯曼时期尤金·阿杰特 (Eugene Atget) 所拍摄的巴黎的照片会有更加丰富的理解。它们所记录的不只是流失掉的；它们做的也是回收的工作：复原老旧的，拒绝将它们抛掉，让它们在新的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也就是说，历史是现代性的一部分，不论人们是鄙视它还是将它包裹在怀旧感的情愫之中。

怀旧感是现代性与现代城市生活的一个部分，董玥将这个问题

更广泛地展开了。她受到今天上海和北京（以及民国时期的北京）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中看到未来的倾向的启发，在怀旧的记忆中找到未来的城市的轮廓。20 世纪中国独特的历史和政治无疑有助于这一复杂的对于过去与未来的理解，对于选择性失忆和幻象性的记忆与未来的关系的理解。但是北京在这方面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共产党执政结束后的布达佩斯，曾经存在着一股强烈的对于战前哈布斯堡王朝的留恋。仅仅在几年前，布宜诺斯艾利斯还在借庆祝这个城市 1910 年的巨大成功来想象这个城市的未来。董玥探索了将城市的过去投射到未来的一个动力关系——她触碰到城市研究中一个非常丰富的主题。

前言

80年代初的一个秋天我上大学时第一次来到北京，一下子就被迷住了。北京让我着迷，一方面是因为火车站自动滚梯和城市地铁这些在当时的中国仍属新奇的事物；另一方面是因为那些有着几百年悠久历史的建筑，和那些在当代中文中已不再具有任何意义的街道名字。当那些现代便利设施的魔力很快变成首都城市生活熟悉的一部分而丧失了它们的新鲜感时，我对这座城市历史的兴趣却渐渐地更加浓厚了起来。乘着公交车或者骑着自行车去探寻这座城市迷宫般的街巷，占去了我在北京大学第一个暑假的所有空闲时间。我背上一壶水，带上一本书，随便跳上一辆公共汽车，随它把我拉到哪里。这座城市的悠久历史，尽管随处可见，但对于我这样走马观花式的观察者来说还是不那么容易理解。但是，我在这座城市的“探险活动”也使我知道，北京也是可以了解和接近的。在几年后的一个春天，我长期在北京大街小巷中穿梭得到的自信给我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当主要的街道都走不通了的时候，我总是能穿街走巷，到达我想要去的地方。

然而，这座在我看来因其丰富的历史和活跃的生机而让人喜爱的城市，却也给它的许多居民带来了日常生活的诸多不便。那些老旧的居民院落的魅力，也因缺乏诸如自来水和卫生间等基本的设施而大打折扣。许多房子雨季漏雨，冬天寒冷。取决于季节和气候变

化，四合院里的房屋要么过分炎热、要么过分寒冷、要么过于潮湿和黑暗。因为一个院子通常挤着几户人家，住户们往往没有一丁点的私人空间。搬出这些院子成了许多家庭的梦想。

这座充满亲和力的城市在十年之内消失了。1995年，离开这座城市六年后，第一次回到北京去做这个研究项目的时候，我已经认不出我眼前的北京城了。人们搬进了高高的塔楼，他们的生活条件表面上看起来正在大大改善。面对所有这些变化，面对眼前琳琅满目的各种事物、各色人等的混合杂处，像大部分人一样，我沉浸在弥漫于北京空气中的那种令人兴奋的气氛中。但是，我很快意识到了这种变化的负面影响。在这座城市的许多地方溜达，已不再让人感觉愉悦了；骑自行车则意味着你要吸纳汽车排放的尾气，忍受阻塞的车流和新建的令人恐惧的立交桥系统。有一次，我去拜访一个朋友，她住在一座公寓楼的第25层。那天电梯坏了，于是我决定去爬那没有窗子的楼梯。当我爬到一半的时候，大楼停电了。我被困在黑洞洞的楼梯中间进退不得。感觉着自己的心脏跳动的声音，我犹豫着是坚持摸索着向上爬，还是回过头下楼去。后来我得知，这种情况随时都会发生，我的朋友经常被迫在同样的黑暗中爬楼梯，一只手抱着她的小儿子，一只手提着大包小包。她总是在手提包里装一只电筒。她的小儿子最喜爱的地方是“他的河”，但是朋友告诉我，那只不过是一条脏水沟，因为附近没有可以玩的地方，孩子只能去那里。当这个孩子到了昆明看到了天上的白云时，他说美极了。别人问他，这些白云像什么啊，他回答说，它们就像“北京天上飘的塑料袋”。

这个小男孩的故事让我难过。难道我们真的只能在没有自来水和卫生间的平房院落和这样的公寓楼之间做出选择吗？难道我们真的只能在长安街和商业区的形象工程与附近完全没有任何适当的公

共场所的居民住宅楼之间做出选择吗？北京近年来的发展从任何标准来看都是令人惊叹的，然而，人们是否从这种高速发展中分享到了公平的利益呢？

关注今日北京居民的日常生活体验让我能够更好地去思考这座城市新近发生的变化，以及这座城市 20 世纪初期的历史。当我开始撰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曾一度着迷于北京曾经发生的有关城市发展与城市保护的争论；现在，当我写完本书的时候，我认识到，对于北京居民来说，与他们关系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在这场争论之外。从阜成门通往石景山的八车道的高速公路就从小男孩的家门前经过，它的建成是北京上世纪 90 年代最为自豪的成就之一。穿过这条路的时候，我要小心地躲开那些运输钢材的载重卡车，这使我想起了圣地亚哥至洛杉矶 I-5 号高速路上的一个交通警示牌，上面画的是一个非法移民家庭，正在狂奔过一条宽阔的、吓人的高速公路。我站在十字路口，手拉着男孩的手——他现在已是一名大学生了——心里祈求着能够再次安全通过这条马路，并期望着这座城市的政府部门在下个工程上马之前，能够问问当地的居民们他们究竟需要什么。我同时也希望城市规划中市民参与机制能够成为现实；我希望这座城市里修建的下一条马路如果不能给当地人带来方便，也至少不会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

过去的几年里，我对北京历史的研究带给我最深的认识就是，无论是思考一座城市的过去还是现在，人们首先应该关注的不是城市建筑及其得失，而是居民对于城市的感觉和体验。一座城市，只有生活在其中的居民拥有呼吸和生存的空间，它才会真正具有活力和动力。“人文尺度”（human scale）这个词不仅指建筑的尺度和形式，更应指广义上的城市规划。城市规划首先要考虑的因素永远都应该是它的居民，而不是发展还是保护这样的命题，更不是把城市

当作国力的展览品。北京应该首先属于它的居民；只有这样，它所展示给世界的才能是根植于人民的生活之中而富有活力的生生不息的传统。

绪 论

“老北京”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为一个让很多人着迷的话题。当过去遗留下来的老房子正一天天被拆毁，以便为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和高层公寓楼腾出空间时，怀旧情绪却开始在这个古老的城市蔓延开来。多年前拆毁的老城墙已无法重建，过去老城时代密切的邻里关系也不再能够保留；留恋“老北京”的人只能在地方小吃和一些保留下来的那个时代的娱乐表演中，在退色的记忆的朦胧回忆中，在观光客们光顾的茶馆中，找到些许的安慰。小胡同和四合院开始吸引外国人的注意，但是普通的北京人家庭正在忙着搬进装着防盗铁门，与邻居“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的高层楼房。当从日本引进的塑料“整体浴室”成了不可缺少的装备时，老式的“社区中心”一样的澡堂便只是留在电影里的事了。晚饭后街边大树下的棋局已不再是一道熟悉的风景，今天城市的夜晚已被机动车的噪音和废气所污染，但是关于老北京的历史的节目和具有地方特色的娱乐节目则每周都在电视上上演。北京城的每一个区都编撰了自己的历史，极力推出本区的名牌商业区和旅游名胜。旧时的商业策略，从一家特色餐馆如何烧一道招牌菜到商店的店员如何招揽顾客，都成为服务业模仿的样板。

关于“老北京”的文学和摄影作品不断涌现。民国时期出版的许多旅游指南、照片和随笔被编辑再版。悉尼·甘博（Sidney